



□ 乔清举 王 越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

2015年1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古人讲，‘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中华文明延绵至今，正是因为有这种根的意识”。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一语出自汉代刘安的《淮南子·原道训》，“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独知守其门。故穷无穷，极无极，照物而不眩，响应而不乏”。这句话的本义为，万物的生存发展各自有着具体特性，百事出现也都有着具体根据，却都知晓保存自己生存的本源、根本才是关键。正因如此，才能够探究、穷尽无穷无尽的事物，观照万物而不会感到晕眩，响应万物的号召而不会感到困倦。其能如此的根本就在于“守其根”。

《说文解字·木部》云：“根，木株也。从木，艮声。”“根”的本义是植物长在地下的部分。在古文中，“根”所指代的就是那些被砍掉树干的木桩子，在现代汉语中，“根”就指树根。“本”在古汉语中之义即为树木的根，《说文解字》指出：“木下曰本。”《国语·晋语一》中也说：“伐木不自其本，必复生。”“根”“本”古今合义，出现了“根本”一词。中国传统文化中多次出现这种“根本”的表述。《广雅·释诂一》中的“根，始也”，《韩非子·解老》中的“根者，书之所谓低也”，《后汉书·宋弘传》中的“盖志士仁人所为根心者也”，陈亮《与彭子寿祭酒》中有“然病之生也，有根有低”，这些语句的出现充分证明着“守其根”的重要性，无论万物产生何种变化，都要复归其根、守住根本，如此才是实现长久发展的核心。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浮沉中之所以能够始终屹立不倒、焕发生

机，其核心就在于能够“守其根”。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因素贯穿中华伦理的发展中，不仅是处世之本，也是为人之根。

守其根就要守“仁”。“仁”作为一种基本的行为规范，贯穿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仁”本身是指果仁，正是果仁赋予了植物生机，促使其不断成长。与此相应，“仁”在人类道德规范中的基本含义也就是一种生机，这种生机于人自身来说，能够使其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孟子·尽心下》就说，“仁者，人也”。将这种生机推广至人类社会之间，就表现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一种各方都得到发展的和谐状态。进一步将这种生机推至自然之间，就会出现“鸟兽昆虫莫不爱”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这样的“仁爱”之心指导下，生态关怀方能实现。

守其根就要守“义”。先贤认为“义”也就是行为的合宜，代表着行为的适当性。守“义”要求去利就义，能够在巨大的现实诱惑面前保持初心，个人要保持心中之“义气”。在一定程度上，功利主义虽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容易打破道德规范，产生纷争。历史上的多数战争，正是对欲望的不断追逐才使得民不聊生，而一个讲道义的国家虽然不使用武器，但也会使得民心归顺。于周庄王十三年、鲁庄公十年、齐桓公二年发生的长勺之战就充分说明了胜利属于正义的一方。该战兴起原因就在于，齐桓公自恃国家强大，为发泄过去的埋怨、不顾他人劝阻进而发起对鲁国的报复，齐桓公意图通过此战一举征服鲁国，但以失败收场。

守其根就要守“礼”。作为礼仪之邦，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包

括礼乐文明。中国在夏商周时期就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将之推广为礼乐教化，以此作为维护社会人伦和谐之基。礼的本质是天地运行的秩序，是万物发展应有的规则。礼本来是一种祈福的原始宗教仪式，后经周公“制礼作乐”的改造，成为基本的社会典章制度。《仪礼》中就记载了周初包括婚礼、相见礼、乡射礼和丧礼在内的十七项礼仪，对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项行为都作出了规范。礼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要能够节制自身的行为，明白行为的是非，懂得尊敬和谦让。最后能够通过守礼、知礼，达到社会的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和为贵”的愿望正是通过守礼的原则达到的，在遵循社会秩序基础上达到的和谐才是最美的境界。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从家庭到社会进而至于国家，都建立在“礼”的原则基础上。中国注重长幼有序、处事有规、以正为本、不欺人伦，与人相交特别注重以礼相待，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弘扬公平、公正、和谐，致力于化解各种矛盾与冲突。

守其根就要守“智”。智者通常被认为是无所不知之人，其人明是非、辨正邪，智也是实现仁、义的重要手段。孔子将“智”与“仁、勇”并列为在任何时代都要通达不变的品格，他认为“知者不惑”，也就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不会被外物所迷惑的。智并不仅仅是指智慧和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明辨是非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帮助人类在面对变化时始终明确何种行为正确、何种行为错误，进而采取相应的措施。然而真正的大智慧产生于忧患之

中，“然后知生于忧患”。“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史实都表明，忧患的境遇比安逸之时更易启示人的智慧。

守其根就要守“信”。《说文解字》云：“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古文从言省。诂，古文信。”信，即为诚实不欺，孟子说“有诸己之谓信”。信包括两重含义：一为“诚”，即诚实，要求言必信，侧重于德；二为“信”，即落实到具体行为之上时要守信用，行必果，侧重于行。商鞅立木为信一事对于推进其变法产生积极影响；尾生的“桥下之盟”也为后世留下佳话；“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季布正是因其诚信得到了汉王朝的重用；曾参杀猪教子等典故都言明了诚信的重要性。诚信具有规范伦理秩序、实现人生价值、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要求，也是国与国之间联系的纽带。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时代的发展总是以不同的姿态出现，但其发展的本质却始终离不开天地的秩序，这种秩序通过“仁义礼智信”规范着人类的行为，循着这种秩序就能通达天地，进而达到“万物皆备于我”。



应、救援处置工作机制；深化基层治理体系改革，创建高度开放条件下的全国最安全地区；创新军地合作体制机制，合力守好祖国南大门。

为当好新时代改革开放示范提供保证和支撑

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海南将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

坚决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坚持重大改革事项由党中央决定，整体工作进度由党中央把握，政策实施情况及时向党中央报告。

加快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鲜明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落实好“三个区分开来”，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健全干部作风能力建设长效机制，激励党员干部投入改革攻坚、啃硬骨头中去，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特别是落实好党中央一揽子增量政策和自由贸易港优化升级政策，以不找借口的态度、不留退路的决心、分秒必争的干劲，全力以赴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深入推进清廉自贸港建设。持续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深化海南“监督一张网”建设，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力量；健全为基层减负和赋能的长效机制，让基层党员干部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为群众办实事上。

《南轩记》中的耕与读

□ 于晓川

曾巩（1019—1083年）是北宋最有影响力的古文家之一，他的《南轩记》是一篇自勉性文章，也是宋代较早明确表现士人耕读生活的记文。读此文，可以了解曾巩的人生志趣与道德追求，也可看到他在清寒生活之中持道自守的自我训诫。

《南轩记》作于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曾巩与弟弟们在南丰耕作谋生。至和元年，曾巩已三十有六，稍有积蓄，在城郊十余里的田边修建茅屋，名为“学舍”，用以藏书、读书。南轩是“学舍”中向南的一间。曾巩在这里得到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历练，并在《南轩记》中记叙了他的耕读生活与人生思考。作为土地的主人，他在这里躬身进行农事劳作。“得邻之弗地蕃之，树竹木、灌蔬于其间”，有幸得到一点田产，以篱笆围起，栽植竹木，种植谷蔬，导水灌溉，亲力亲为。从事劳动生产，他在四时轮换中，开垦、栽植、灌溉、收获，农忙甚至会在田间地头吃饭、夜宿。天暖水绿时急于耕地，晴日抓紧赴田中劳作，与弟弟们共同收割新稻。既是生存的需求，也有心性的磨炼、价值感的获得，他体会了饷饷满家、稻足鸡肥的喜悦。物质生活逐渐获得改善，正是曾巩带领家人勤于稼穡的结果。

“伏闲隐奥，吾性所最宜”，躬耕田亩之中，居于幽僻之地，切合他的本真性情，“结茅以自休，翫然而乐”，有余地可修建茅屋，在此休憩，是难得的闲逸之乐，因此曾巩说，“世固有处廊庙之贵，抗万乘之富，吾不愿易也”，以廊庙之贵、万乘之富也不愿交换。不过，于他而言，这不愿交换的，是少有的安闲，更是既耕亦读的生活。曾巩在这茅屋收藏了数量极为可观的书籍，达两万余册。书籍的时间跨度大，从秦汉至宋皆有收入。曾巩认为，这些藏书是圣人先贤、有识之士殚精竭虑、发挥专长、分析辨别天地万物的道理而写成的。所著或论赞美好事物、讽喻心怀不轨之人，或感发于微小之处而寄托深远。“于天地万物，小大之际，修身理人，国家天下治乱安危存亡之致，罔不毕载”，对天地万物、小事与大道之间的关系、自身修养、国家治乱安危等，都加以详细记载。与这些藏书在一起，正如与益友相切劘，颐养心性、明晰事理、增长见识。因此在躬耕田亩、处理家务之外，他“虚窗达深暝，明膏续飞光”，日夜苦读。结合田间劳动的经验，他还以春种秋收、研磨谷物比喻求学求索的过程。足够勤劳，就自然会有稻谷收获而不用担心粮仓空匮。努力经营，所得也会积累越来越多。“既多又须择，储精弃其糠”，有丰富的储备，就可以择出糟糠，留下精良的部分。“昔废新开辟，新输日收藏”，学问日益精进，当然是“万乘之富”交换不了的。

北宋士人文辞间常见以天下为己任的阔大情怀，不见用于世时，亦能持道自守。曾巩即如此。居南丰，远京师，处大山长谷之中，日日为稻粱谋，却不忘手持书卷，孜孜以求，是因为“所好者远”，喜圣人之言，愿以儒道济天下。未能实现之时，他便以儒家君子人格要求自己。两次科考不第，家中杂务繁复，曾巩承接孔子“忠恕”“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思想，提出“养吾心以忠，约守而恕行之”，要用忠义来修养自己的道德、检视自己的操守。待人要宽厚，犯了错就加以改正。要勇于进取，不知息怠。他还认为，士人应“得其时而行”，如果君子有好的机遇还要守在深山长谷而不去做官、有所作为，是不对的。“不得其时

则止”，如果没有遇到好的时机，那就不要勉强，这时还要不顾一切推行主张，也是不恰当的。居于卑巷穷庐，冗衣蓍饭，田中劳作，筋骨疲惫，曾巩可谓“不得其时”，但不抱怨不解怠，孝亲友，操劳弟妹婚嫁，静心读书，怡然弄志，带领弟弟、妹婿成就了“一门六进士”的辉煌，践行了儒家之修身、治家之道。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持道自守、自我训诫，待出仕为官，曾巩到越州、齐州等地任职时，也能怀抱兼善天下的理想，革除赋役弊端、积极救灾、兴修水利，“除其坚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整顿社会治安，兴建学校、讲说六经，实现人民安乐。

在耕读生活中，曾巩广读百家之书，开阔视野，却“一正以孔孟”，愈发坚定以儒道为思想根本，并努力以文传道，至老不变。他还认为文章有留存圣人之道的功用，圣人之道不经辨析不能得以显明。因此极强调研读儒家经典，评价文章也以“道”为根本标准。他在《南轩记》中提醒自己要好持道自守，并将所作记文书于墙壁，“蚤夜览观焉，以自进也”，日日观看，以鞭策自己有所进步。

《南轩记》所呈现的耕读生活，是曾巩最重要的人生阶段之一，他以耕读为乐，抱持“扶衰救敝之心”，以儒家君子人格自律，在耕读中改善了生活状态，也促进了学行的提升与文章的精进。嘉祐二年（1057年）曾巩及第，走向仕途，在京时校勘、整理史书、诗文集，外任时勤勉为政，颇有治声，其间皆以文传道，不为空言。《宋史·曾巩传》评其“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纾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派”，是给这位持道自守、胸怀远阔的文章家的最好评价。明清时期，曾巩得到唐宋派、桐城派的尊崇，文章成为士子学习的典范，遂列于“唐宋八大家”之中。

